

# 论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以《马瑞王室档案》为依据

陈艳丽 王志强\*\*

**内容提要** 青铜时代中期，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地区阿摩利人政权纷纷建立，并逐渐形成了几个大国间的政治均势，而伊朗高原上的埃兰王国持续干涉两河流域事务并一度取得了凌驾于两河流域之上的政治优势。在这一国际政治局势的背景下，该地区形成了以几个大国为主导的、众多小国积极参与其中的多元外交体系。而叙利亚地区出土的《马瑞王室档案》则是为数不多的记录这一外交体系的重要历史文献。通过解读这些文献，可知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的大小国家间通过书信往来、礼物互赠、政治联姻等多种方式，一度构建起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外交体系。

**关键词** 青铜时代中期 西亚地区 外交关系 《马瑞王室档案》

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 2000 ~ 前 1600 年）是古代近东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黄金时间。<sup>①</sup> 目前，现代学者对于该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发掘于叙利

---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瑞王室档案》与公元前两千纪早期西亚外交研究”（22BSS046）和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究项目“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研究”（2023 ECNU-XWHSX-06）资助。

\*\* 陈艳丽，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王志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西亚北非文明。

① 古代近东国际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早王朝和阿卡德帝国时期（约公元前 2500 ~ 前 2000 年），主要文献证据是古代叙利亚地区的埃卜拉（Ebla）王国遗址出土的档案；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 2000 ~ 前 1595 年），主要文献证据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瑞（Mari）王国遗址出土的档案；危机和变革时期（约公元前 1595 ~ 前 1400 年）；阿马尔纳时期（约公元前 1400 ~ 前 1300 年），主要文献证据是阿马尔纳出土的书信档案。第一个时期基本包含在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中，第二个时期大体上相当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中期，第三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大体上等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

亚阿布凯美地区的《马瑞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sup>①</sup>该地区为古代马瑞王国都城所在地,从该城王宫遗址中发现的约2.5万余块楔形泥板文献不仅记录了当时马瑞王国的行政管理和各类经济活动,其中包含的千余件外交书信还反映了从公元前21世纪末至公元前18世纪中期,西亚地区各国间外交往来的具体内容及遵循原则。因此,有西方学者甚至将西亚历史上的这段时间称为“马瑞王室档案时期”。

目前,国内外学者多以《马瑞王室档案》中的相关文献为研究依据,将青铜时代中期的西亚外交放在整个近东外交史的框架之内进行考察。例如,拉丰特(Lafont)整体回顾了从公元前3千纪末至“马瑞王室档案时期”再至“阿马尔纳时期”近东外交体系的形成过程,尤其强调了《马瑞王室档案》对于考察古代近东外交体系演变的重要性。<sup>②</sup>波达尼(Podany)以古代近东国家构建的“兄弟”(ahu)关系为线,在从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300年的千余年时间里,从地区性的国家间的交往活动中勾勒出一张涵盖整个近东社会的国际关系网。<sup>③</sup>兰金(Rankin)曾从独立国和附属国、条约、仲裁和调解、信件和礼物交换、外交使团几个方面对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西亚外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但是由于史料的限制,其研究仍有值得商榷之处。<sup>④</sup>奥勒(Oller)通过对

① 1933年秋,法国考古学家在叙利亚阿布凯美地区的考古遗址哈瑞瑞丘(Tell Hariri)挖掘出了2.5万余块楔形泥板文献,因该土丘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古代马瑞王国的宫殿遗址,所以这批档案被学界称为《马瑞王室档案》,其类型包括书信、行政管理文献、文学作品、法律文献等。以法国为主的亚述学者们对这批楔形泥板文献进行了整理并将其陆续出版,从1950年至今共出版了32卷。这批档案开始于军事总督沙卡那库(šakkanakku)统治时期(公元前2266~前1920年),终于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对马瑞的征服和摧毁之年(公元前1762年),总历时约500年,但大多数档案集中于亚述人和金瑞林统治的公元前18世纪。档案中收录的文献多数为日期确定的行政管理文献,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框架,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数千件没有确定日期的书信档案,而这些书信档案则提供了当时国家治理、国际政治、国际交往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丰富信息。

② Bertrand 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2, No. 1, 2001, pp. 39-60.

③ Amanda H. Podany, *Brotherhood of Kings,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p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J. M. Munn Rankin,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 C.," *Iraq*, Vol. 18, No. 1, 1956, pp. 68-110. 然而,兰金写作该文时《马瑞王室档案》只出版了6卷,供其使用的文献证据有限,且因一些文献识别上的错误其论述中有一些不严谨之处。例如,《马瑞王室档案》第2卷第55号书信是马瑞总督亚斯马赫阿杜写给他的父亲、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的,但兰金将其识别为一位马瑞官员写给马瑞王金瑞林的信件。

古代西亚外交中信使和使节的研究，为对古代近东外交的使节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sup>①</sup> 杜朗（Durand）、沙潘（Charpin）等学者在进行档案整理和翻译的同时，对涉及与外交有关的内容也进行过评述。同时，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例如，有学者以该时期马瑞王国与叙利亚地区<sup>②</sup>的延哈德（Yamhad）王国之间的政治联姻为主线，论述其所遵循的范式和准则。<sup>③</sup>

鉴于青铜时代中期的西亚外交在整个古代近东外交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文以《马瑞王室档案》中的行政管理文献和外交书信为原始文献证据，结合同时期其他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献，综合分析该时期西亚地区国家间外交往来中所采取主要方式、具体内容与交往过程中所遵循的外交惯例和规则，以探讨这一多元外交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 一 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的国际关系

随着青铜时代早期叙利亚地区城市社会的崩溃和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1～前2004年）王权的瓦解，阿摩利人在青铜时代中期成为主导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地区历史的主要民族，他们建立的国家统治着从地中海直至波斯湾的广大地区，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着各国间的“政治均势”。同时，伊朗高原的安善（Anšan）和苏萨（Šuša）也在这一时期结成了统一的埃兰（Elam）王国，进入了古代埃兰历史上的“苏卡尔马赫”（sukkal-mah）时期，并一度取得了凌驾于两河流域之上的政治优势。在这一背景之下，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大小王国间进行了频繁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外交往来。

### （一）阿摩利人政权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的建立

阿摩利人政权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的广泛建立是青铜时代中期西

① G. H. Oller, “Messengers and Ambassadors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in J.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I,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5, pp. 1465 - 1473.

② 本文的叙利亚地区指从地中海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广大区域。

③ 陈艳丽、张宝利：《古巴比伦时期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73～180、192页。

亚地区的一个政治特征，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阿摩利王国时期”。<sup>①</sup>公元前2004年，埃兰军队攻陷乌尔城成为古代西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有学者认为“（苏美尔）帝国瓦解的原因是由西方迁徙来的塞姆族阿摩利各部落突破了前王舒辛在其统治的第三年修建的‘阿摩利城墙’，纷纷进入中原，先后居住在各大城市的周围，后逐渐进入城市，从而切断了乌尔与各行省的联系。各省的‘恩西’不得不各自为政，保卫城邦不受阿摩利人的入侵。而许多城市的首脑和官员本来就出身于阿摩利或阿卡德”。<sup>②</sup>乌尔帝国崩溃后，阿摩利人则迅速填补了埃兰人撤走后留下的两河流域地区的权力真空。巴比伦（Babylon）、拉尔萨（Larša）、马瑞、基什（Kiš）、马腊德（Marad）、西帕尔（Sippar）等阿摩利人国家纷纷建立。其中，伊辛（Isin）王朝（公元前2020～前1794年）和拉尔萨王朝（公元前2025～前1763年）为争夺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霸权进行了200余年的斗争，最终以拉尔萨国王瑞姆辛（Rim-Sin）于公元前1794年攻陷伊辛城告终。

叙利亚地区与两河流域的情况类似。考古学家们认为，在公元前3千纪晚期，气候变化导致的持续干旱耗尽了叙利亚早期城市的农业能力，而城市社会本身的集约化生产又造成了环境恶化，从而导致了其早期城市的迅速崩溃。至青铜时代中期，外部复杂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刺激、原有的小规模政治实体的生存、气候条件的改善和新的种族群体的到来，使叙利亚地区开始了复杂社会的“重塑”过程。<sup>③</sup>其中，新的种族群体就是指阿摩利人，“上述来自叙利亚各地的人名说明了这一点，阿摩利人接管了最重要的中心地区的政治统治，下文所引用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sup>④</sup>阿摩利人在叙利亚地区建立的众多王国中，最强大的是都城位于阿勒颇（Aleppo）的延

① 从公元前20世纪末期早期国家的建立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城被赫梯人劫掠，阿摩利人在从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建立过政权，参见 Aaron A. Burke, *The Amorites and the Bronze Age Near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0.

② 刘文鹏、吴宇虹、李铁匠：《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209页。

③ Peter M. M. G. Akkerman, Glenn M. Schwartz, *The Archaeology of Syria, from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to Early Urban Societies (c. 16, 000 - 300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86 - 288.

④ Horst Klengel, *Syria, from 3000 to 300 B. C.: 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2, p. 43. 该时期西亚王国统治者如延哈德王亚荏林（Yarin-Lim）、马瑞王金瑞林（Zimri-Lim）、安达瑞格王卡尔尼林（Qarni-Lim），同时期的埃卜拉（Ebla）王伊比特林（Yibbit-Lim）等都具有典型的阿摩利语名字，由此可推断这些统治家族间存在一定的渊源。

哈德王国。从公元前 19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的 200 年, 历经 9 位国王统治的延哈德一度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起了“阿勒颇大王权”。<sup>①</sup> 此外, 还有位于延哈德南方的卡特那 (Qatna)<sup>②</sup> 和北方的卡尔凯米什 (Kar-Kemiš/Carchemish)<sup>③</sup>、哈舒 (Haššum)<sup>④</sup> 与乌尔苏 (Uršum)<sup>⑤</sup> 以及位于地中海的乌鲁里特 (Ugarit)<sup>⑥</sup> 和古卜拉 (Gubla)<sup>⑦</sup> 等。而与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

- 
- ① 关于延哈德王国在叙利亚地区统治的论述参见 I. E. S. Edwards, C. J. Gadd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Part 1,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800 – 1380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1 – 36。
- ② 在公元前 19 世纪至前 17 世纪的 200 年, 卡特那是叙利亚地区实力仅次于延哈德的另一个阿摩利人政权。它位于公元前 2 千纪西亚地区三条重要商贸路线的交会处, 位置十分重要。相关论述参见 Amanda H. Podany, *Brotherhood of Kings,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p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6 – 77。另外, 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早期开始, 卡特那和延哈德就是敌对的关系, 支持它们中任何一个的第三方都注定会被另一方视为敌人, 如下文中出现的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一世。该国王最初与延哈德国王苏姆埃普赫保持了友好关系。后来因为亚述人在幼发拉底河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沙姆西阿达德又谋求与卡特那的盟友关系, 以便向地中海扩张其势力。由此, 亚述人与延哈德人转为敌对关系。参见 Trevor Bryce, *Ancient Syria: A Three Thousand Ye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0。
- ③ 卡尔凯米什坐落在阿勒颇城以北的幼发拉底河西岸, 是两河流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进行长途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尤以盛产葡萄酒闻名。在青铜时代中期, 它与马瑞王国的关系较为密切, 《马瑞王室档案》中多次提及统治者与马瑞统治者间的外交礼物往来。在沙姆西阿达德统治时期, 其统治者阿坡拉韩达 (Apla-Handa) 与沙姆西阿达德的次子、担任马瑞总督的亚斯马赫阿杜书信往来频繁, 且二人在其中常互称“兄弟”, 这从侧面反映出卡尔凯米什为沙姆西阿达德统治的亚述的从属国。
- ④ 哈舒位于阿马努斯 (Amanus) 山脉东侧的马腊簇 (Marau) 河谷, 其扼守着从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北方进出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重要路线之一。关于该地的识别和论述参见 Lynn Swartz Dodd, “Strategies for Future Success: Remembering the Hittites during the Iron Age,” *Anatolian Studies*, Vol. 57, 2007, pp. 209 – 210。
- ⑤ 乌尔苏是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中心, 靠近安纳托利亚高原, 但目前仅知其大致位置, 位于卡尔凯米什以北、幼发拉底河右岸。Charles-F. Jea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I, *Lettres Diverses*,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p. 131。乌尔苏的贸易中心 (karnum) 是亚述和安纳托利亚长距离区域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叙利亚地区的商人也经由此地与阿纳托利亚诸国进行商业活动, 主要贸易品为安纳托利亚盛产的铜。Horst Klengel, *Syria 3000 to 300 B. C.: 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2, p. 41。
- ⑥ 对青铜时代中期乌鲁里特历史的研究参见 Mary E. Buck, *The Amorite Dynasty of Ugari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0。
- ⑦ 古卜拉是毕布罗斯 (Byblos) 在阿卡德语文献中的拼写, 它是马瑞档案中所提及的地中海沿岸城市中最南端的一个。Georges Dossin, “Les archives économiques du Palais de Mari,” *Syria*, T. 20, Fasc. 2, 1939, p. 111。

域政局的频繁变动不同,在强大的延哈德王国的领导之下,青铜时代中期叙利亚地区的政局整体上比较稳定。

## (二) 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政治均势”的形成

随着阿摩利人国家在西亚地区的建立,各国间的冲突与争斗也逐渐增多。其中,沙姆西阿达德一世(Šamši-Adad I,公元前1809~前1776年在位)是第一位对整个地区政治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的阿摩利征服者。沙姆西阿达德最初从他的酋长父亲那里继承的是一个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名为埃卡拉图(Ekallatu)的小王国。他于公元前1809年入主了传统的亚述都城阿淑尔(Aššur),随后征服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土地,首次完成了阿摩利人对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上两河流域王国”(Kingdom of Upper Mesopotamia)。<sup>①</sup>随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向西进军地中海的军事行动,<sup>②</sup>并在公元前1793年夺取了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极具战略价值的古老城邦马瑞,其统治领土从今天伊拉克的北部一直向西延伸至叙利亚的部分地区。<sup>③</sup>同时,在沙姆西阿达德占领马瑞的前一年,拉尔萨国王瑞姆辛刚获得与伊辛王朝争霸战争的最后胜利。由此,拉尔萨、亚述、卡特那和延哈德共同成为当时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最为强大的四个政治势力,而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则沦为了亚述的附属国。<sup>④</sup>在沙姆西阿达德统治后期,基于向地中海扩张的战略决策,其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转为与延哈德相抗衡。不过,公元前1776年,在经过

① “上两河流域王国”一般为国外学界的称呼。吴宇虹教授认为沙姆西阿达德所建立的国家的统治范围与后来的亚述国家大致相当,且继承了古亚述的王统,可以称其为亚述国王,称其建立的统一王国为“亚述第一帝国”,参见刘文鹏、吴宇虹、李铁匠《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222~223页。由于沙姆西阿达德的祖父、父亲、兄长和本人均位列《亚述王表》之中,本文在相关论述中也采用了国内学者这一观点。

② Douglas R. 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 4: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pp. 606-608.

③ [法]乔治·鲁:《两河文明三千年》,李海峰、陈艳丽译,大象出版社,2022,第221页。

④ Wu Yu Ho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un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End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 Šamši-Adad)*, Changchun: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994, pp. 116-117.

近 30 年的征战后，沙姆西阿达德可能死于与延哈德的战斗中。<sup>①</sup>

沙姆西阿达德的去世对西亚地区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亚述帝国的虚弱本质开始暴露，亚述人在各地的领土纷纷丢失，其长子伊什美达干（Išme-Dagan，公元前 1780 ~ 前 1741 年）统治下的以埃卡拉图为中心的亚述国家，很快就沦为了西亚地区的“二等势力”。<sup>②</sup> 而两河流域北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区因为失去了统一的因素而分裂为数量众多的小国。其次，位于两河流域东部迪亚拉河地区的埃什依那（Ešnunna）王国趁亚述衰落之际迅速向西挺进，并占领了一些地区。<sup>③</sup> 再次，在阿勒颇避难的马瑞王子金瑞林（约公元前 1775 ~ 前 1762 年在位）在延哈德国王亚荏林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趁机从亚述人手中夺回了其家族对马瑞的统治权。对于这一事态发展的记录来自该时期的一封外交书信，其中曾提及在沙姆西阿达德刚去世时，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有四位强大的国王。<sup>④</sup> 杜朗和亨佩尔（Heimpel）等学者认为这四位强大的国王分别是延哈德的亚荏林、卡特那的阿穆特皮埃勒（Amut-pi-El）、巴比伦的汉谟拉比（Hammurabi）和拉尔萨的瑞姆辛。<sup>⑤</sup> 同时，金瑞林在巩固了对马瑞的统治之后，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活动迅速建立起了马瑞在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使其成为

① Dominique Charpin, Jean-Marie Durand, “La prise du pouvoir par Zimri-Lim II,” *Mari Annales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s* 4,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5, pp. 318–319.

② 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一封信中要求伊什美达干“对那些以‘儿子身份’写信给我的国王以‘兄弟’身份写给他们，对那些以‘兄弟’身份写信给我的国王以‘儿子’身份写给他们”。按照该时期古代近东的外交惯例，伊什美达干已经不再被承认为是一位大国领袖了，参见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84。

③ “一些出土于马瑞的信件表明了埃什依那军队的前进；他们已经到达了幼发拉底河边的距西帕尔 3 天路程的腊皮苦城（Rapiqum），并向上游移动。……埃什依那的军队没有远达马瑞，因为（国王）伊巴勒皮埃勒（Ibale-pi-El）并没有提及对这座城市的占领。”参见 I. E. S. Edwards, C. J. Gadd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Part 1,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800–1380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④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03.

⑤ Wolfgang Heimpel, *Letters to the King of Mari*, Indiana: Eisenbrauns Winona Lake, 2003, p. 291, note 2.

不少叙利亚北部小国共同的“盟主国”。<sup>①</sup>而迪亚拉河地区的埃什依那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也不断扩大其在两河流域事务中的影响力。

由此，马瑞和埃什依那也逐渐上升到与巴比伦和拉尔萨等国平等的地位。一封马瑞书信对此有清晰的描述：“关于我主（金瑞林）传递给这些（马瑞的附属国）国王的信息，说‘来（马瑞城）参加伊什塔尔女神（Ištar）的祭祀！’我使他们在沙尔马奈赫（Šarmaneh）集合，并说了如下的话：‘没有一位国王，他自己是最强大的！10个或15个国王追随巴比伦（Babylon）的统治者汉谟拉比，相似数量的国王追随拉尔萨的瑞姆辛，相似数量的国王追随埃什依那的伊巴勒皮埃勒，相似数量的国王追随卡特那的阿穆特皮埃勒，有20个国王追随延哈德的国王亚荏林。’”<sup>②</sup>书信开始处的“这些国王”指金瑞林的追随者，其数量应与除亚荏林外的国王追随者的数量相似。

由此信可知，在亚述衰落之后，巴比伦、拉尔萨、埃什依那、卡特那、延哈德和马瑞等六国间的互动，取代了曾经的亚述、拉尔萨、卡特那和延哈德等四国间的合作与对抗，成为主导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事务的领导力量。在此基础上，这几个国家又与各自的附属王国结成了几个区域性的政治联盟。几大强国间“政治均势”的建立、数量众多的小国在夹缝中求存，成为该时期西亚地区的又一政治特征。

### （三）埃兰取得凌驾于两河流域之上的政治优势

除两河流域与叙利亚地区诸国之外，位于伊朗高原的埃兰王国也是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一员。埃兰在整个青铜时代都处于一个独特的战略地位，因为它为整个近东世界提供了冶炼青铜的珍贵原料锡。<sup>③</sup>青铜时代中期埃兰人的统治范围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位于札格罗斯山

① Dominique Charpin, Jean-Marie Durand, “La prise du pouvoir par Zimri-Lim II,” *Mari Annales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 4,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5, pp. 293 – 343.

② Stephanie Dally, *Mari and Karana, Two Old Babylonian Cities*,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2, p. 44.

③ J. D. Muhly, “Tin Trade Routes of the Bronze Age: New Evidence and New Techniques Aid in the Study of Metal Sources of the Ancient World,” *American Scientist*, Vol. 61, No. 4, 1973, p. 407.

脚下的平原（即低地埃兰<sup>①</sup>），其都城为苏萨（Suša/Šušim）；另一部分为东南部的高地埃兰<sup>②</sup>，其都城为安善。苏萨和安善的统治者在马瑞经济文献中一般被称为“国王”（šarrum）<sup>③</sup>，但在马瑞书信中多被称为“苏卡尔”（sukkal）或“苏卡尔马赫”<sup>④</sup>。此时的安善和苏萨应组成了一个以前者为主的国家。在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和马瑞王金瑞林之间签订的一个外交条约中，也将安善的“苏卡尔马赫”施瓦-帕拉尔-胡赫帕克（Šiwa-Palar-Huhpak）作为敌对埃兰的主要代表。<sup>⑤</sup>

青铜时代中期埃兰与两河流域的交往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两河流域的阿摩利国王们延续了青铜时代早期的交往模式，有时袭击埃兰人的领土，有时把他们的女儿嫁给埃兰统治者；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平静时期；然后是埃兰开始主动介入两河流域事务并试图进一步征服两河流域的所有地区。<sup>⑥</sup> 马瑞王金瑞林和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称呼埃兰的“苏卡尔马赫”为“父亲”的马瑞外交书信，也证明了埃兰确实一度取得了凌驾于两河流域诸王之上的政治优势。<sup>⑦</sup> 至公元前1765年，埃兰甚至借助巴比伦和马瑞的军事支持一度消除了埃什依那王国在两河流域的强大政治影响。不过，埃兰人进一步征服两河流域的企图导致了联盟的逆转，巴比伦、拉尔萨和马瑞

① 低地埃兰相当于现代伊朗的胡齐斯坦省（Khuzistan）。Šušim 是 Suša（苏萨）在阿卡德语文献中的拼写。阿卡德帝国（Akkad）的建立者萨尔贡（Sargon，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位）曾击败了埃兰阿万王朝国王率领的联军，迫使埃兰、瓦腊舍等地的国王和总督成为其属臣。从那时起，阿卡德帝国的总督将苏萨从一个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提升到都城的地位，因此阿卡德语则被推行为埃兰的官方语言。参见 Georges Roux, *Ancient Iraq*,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2, p. 141。

② 即现代伊朗的伊斯法罕省（Isfahan）。

③ 见该文第三部分“马瑞向其他国家赠送贵金属礼物列举”表格内容。

④ 所以这段时间也被称为埃兰历史上的“苏卡尔马赫”时期（约公元前1900～前1500年），参见 Elizabeth Carter, Matthew W. Stolper, *Elam, Survey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24-31。另外，sukkal-mah 一词为苏美尔语，有“首席官员”之意，国外学者多将其译为“Grand Vizier”。本文采用音译法，直接将其译为“苏卡尔马赫”。

⑤ Jean-Marie Durand, *Les document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 (Tome I)*,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2000, nos. 290。

⑥ F. Vallat, “L’Élam à l’époque paleo-babylonienne,” *Amurru*, Vol. 1, 1996, pp. 297-319。

⑦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62, 449。

转而联合起来反对埃兰和埃什依那并取得了胜利，由此终结了该时期埃兰对两河流域的政治优势。<sup>①</sup>

总之，在青铜时代中期，基于西亚地区“政治均势”的建立，延哈德、卡特那、亚述、拉尔萨、巴比伦、埃什依那、马瑞、埃兰等大国之间，各大国与其附属国之间，在诸大国的夹缝中求存且叛服无常的诸小国之间，均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外交使节和信使们穿梭往来于各国之间，传递外交书信，交换外交礼物，协商建立攻守联盟、军事合作和王室联姻等，由此便形成了古代近东外交史上的由几大国主导的、数量众多的小国积极参与其中的多元外交时期。

## 二 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的书信往来

在古代近东外交史上，外交书信往来是国家间交往的一种主要方式。据不完全统计，《马瑞王室档案》中的外交书信有1000余件，均以古代近东的通用语言阿卡德语书写。马瑞外交书信的范式和内容记录了青铜时代中期的国家大小和它们的统治者在西亚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记录了这些国家之间外交往来的主要方式和在以各种方式交往的过程中需遵循的惯例和一般规则。

### （一）外交书信的称呼范式及其所反映的国家间关系

与《阿马尔纳书信》带有王衔的称呼语及之后礼貌的问候相比，马瑞外交书信的称呼语简洁明了，其后没有客套的问候，通常是直奔主题。而从此类称呼语来看，这一时期外交书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间的往来书信；二是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国家间的往来书信。

其中，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的统治者间相互往来书信的称呼语一般为“对X说，你的‘兄弟’（*ahu-ka*）Y的话如下，……”，以此表达一种“兄弟”关系。例如，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在写给卡特那国王伊什希阿杜的信中说“对伊什希阿杜说，你的兄弟沙姆西阿达德的话如下（*ana Ishi-*

<sup>①</sup> Dominique Charpin, *Hammurabi of Babylon*, London: I. B. Tauris, 2012, pp. 35 - 72.

Addu *qibi-ma umma* <sup>d</sup>Šamši-<sup>d</sup>Adad *ahu-ka-ma*)”<sup>①</sup> 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之间通信的称呼语为“对汉谟拉比说，你的‘兄弟’金瑞林的话如下 (*ana Hammurabi qibi-ma umma Zimri-Lim ahu-ka*)!”<sup>②</sup> “对金瑞林说，你的‘兄弟’汉谟拉比的话如下 (*ana Zimri-Lim qibi-ma umma Hammurabi ahu-ka*)!”<sup>③</sup> 幼发拉底河北部地区的安达瑞格 (Andarig) 国王卡尔尼林写给金瑞林的称呼语为“对金瑞林说，你的‘兄弟’卡尔尼林的话如下 (*ana Zimri-Lim qibi-ma umma Qarni-Lim ahu-ka*)”<sup>④</sup>

而地位不平等国家间的外交书信多为一个联盟内的领导者与其成员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其称呼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对我的主人 (*bēli-ya*) X 说，你的仆人 (*arad-ka*) Y 的话如下”，与之对应的是“对 Y 说，你的主人 (*bēli-ka*) X 的话如下”；二是“对我的父亲 (*abu-ya*) X 说，你的儿子 (*mār-ka*) Y 的话如下”，与之相对应的是“对 Y 说，你的父亲 (*abu-ka*) X 的话如下”。两种方式都在有意建构一种“主仆”或“父子”关系。而根据对相关文献的统计，在马瑞王金瑞林与其统领的幼发拉底河中上游的附属国统治者之间的通信中，“主仆”关系的使用更为频繁。例如，以哈布尔河三角洲地区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与金瑞林的通信为例，乌尔基什 (Urgiš) 国王泰如 (Terru) 在四封信中均称金瑞林为“我的主人”，前者则自称为金瑞林的“仆人”<sup>⑤</sup> 阿什那库 (Ašnakkum) 国王沙杜姆拉布亚 (Šadum-Labua) 在写给金瑞林的九封信中，有八封中称呼金瑞林为“我的主人”，并自称为“你的仆人”。<sup>⑥</sup>

然而，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外交书信中的“兄弟”关系并不是这一

①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 Correspondance de Šamši-Adad*,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24.

②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2, 11, 23.

③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1, 3 - 5.

④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167 - 170.

⑤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44 - 46.

⑥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99 - 100, 102 - 107.

时期的首创。早在青铜时代早期,叙利亚地区的埃卜拉国王伊尔卡卜-达穆(Irkab-Damu)就已经和距离其数百英里(1英里=1609.344米)之外的哈马兹(Hamazi)国王以“兄弟”来表达彼此间的关系:“埃卜拉国王伊尔卡卜-达穆是哈马兹国王孜孜的兄弟,哈马兹国王孜孜是埃卜-拉国王伊尔卡卜-达穆的兄弟”。<sup>①</sup>这封信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古代西亚地区最早的外交书信,而信中出现了七次的“兄弟”称呼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兄弟”关系的维护,而且可能亦非首创。<sup>②</sup>此后,大国的国王被称为“父亲”,他们的附属国的国王被称为“儿子”。这种以“兄弟”“父子”关系的模式来建构国家间关系的思考,符合古代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人民对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的认知。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民来说,家庭于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父慈子孝、兄弟和睦是最基本的秩序体现。他们对神界及人类世界的认识也是从家庭关系中获得线索的,在他们看来,神界的忠诚和争斗与人类世界是一样的,家庭规则就是世界规则的映射,所以无序的世界就是子不孝父、兄弟反目的世界。<sup>③</sup>到了青铜时代中期,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大小政权的主要建立者基本上都出自各个阿摩利部落,而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则是牢固建立在亲属关系的纽带之上的,“虽然构成部落的主体概念在部落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亲属意识形态可能在定义部落成员资格方面发挥了作用。部落身份通常是用亲属关系来描述的,成员关系至少部分是根据亲属关系建立的。在《马瑞王室档案》中最直接的证明是部落群体的共同前缀dumu<sup>④</sup>的高频出现,如‘雅明部落之子’(dumu~Yamīna),‘亚穆特巴勒部落之子’(dumu~Yamūt-bal),‘席马勒部落之子’(dumu~Simal)”。<sup>⑤</sup>所以,部落出身的王国的统治者们在对家庭和社会秩序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① P. Michalowski, *Letters from Early Mesopotamia. Writing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3*,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3, pp. 13-14.

②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2000, p. 3.

③ 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50.

④ dumu为苏美尔语词,意为“儿子”。

⑤ Adam E. Miglio, *Tribe and State,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eign of Zimri-Lim*,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p. 48-49.

以“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构建国家间关系的惯例，非常易于接受和遵循。<sup>①</sup>

另外，在一般情况下，“父子”或“主仆”关系反映出了一个联盟内的领导力量与附属国之间的地位差异，但有一些个例也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在马瑞王金瑞林写给延哈德王亚荏林的信中，他称呼亚荏林为“我的父亲”，自称为“你的儿子金瑞林”。<sup>②</sup>这一称呼语并不能表示马瑞成为延哈德的附属国，因为二者间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实际上，亚荏林是金瑞林的岳父，所以这是一种基于真实家庭关系的表达。另外，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与马瑞总督亚斯马赫阿杜之间的通信均以“父子”相称，这无关国家间的关系，因为马瑞此时已沦为亚述的一个行省，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了，“父子”称呼基于二者间事实上的血缘关系，亚斯马赫阿杜是沙姆西阿达德的次子。

最后，国家间的“兄弟”、“父子”或“主仆”关系不是恒定不变的。某一国家在整个地区或某个联盟内的地位，经常随着该国实力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叙利亚地区的卡特那王国曾位列主导西亚地区国际事务的几个大国之一。但在其国王阿穆特皮埃勒统治后期，他在与金瑞林的通信中自称为“你的仆人阿穆特皮埃勒”。<sup>③</sup>这表示在该时期卡特那已下降为西亚地区的二等势力了。另外，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安达瑞格王国在卡尔尼林统治时期，其与马瑞之间是地位平等的“兄弟”关系。<sup>④</sup>在卡尔尼林被杀、阿覃润（Atmrum）继位后，两国之间就应遵循“兄弟关系”还是“主仆关

- 
- ① 对于古代近东外交关系中的“父和子”关系的讨论，参见 F. C. Fensham, “Father and Son as Terminology for Treaty and Covenant,” in H. Goedicke, ed.,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121 – 135. 对公元前 2 千纪早期西亚外交中“兄弟”、“父子”和“主仆”关系的探讨，参见 J. M. Munn-Rankin,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 C.,” *Iraq*, Vol. 18, No. 1, 1956, pp. 74 – 84.
- ②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16.
- ③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113, nos. A. 1867.
- ④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 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67 – 170.

系”发生过争议。<sup>①</sup>阿覃润死后,继位的恒迪亚(Himdiya)在写给金瑞林的信中自称为“你的仆人恒迪亚”。<sup>②</sup>卡特那、安达瑞格等案例表明,马瑞外交书信的称呼语可以反映出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某个国家的地位在整个外交体系内的动态变化。

## (二) 外交书信内容反映的国家间的外交活动

马瑞外交书信所载的国家间的交往活动内容十分庞杂。概括来说,地位平等的国家间的统治者在书信中主要就国际局势变化互通消息,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就政治联姻、外交条约的签订等进行协商,其中军事合作是最主要的议题。地位不平等的国家间的统治者在书信中除了探讨上述几个主题外,还多涉及联盟内的领导力量与附属国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履行问题,尤其是对附属国需履行义务的限定。联盟内附属国需履行的义务有:供养在其国土内的盟主国的驻军,同时为后者提供军事支持;放弃所有独立的外交联系,引渡逃犯,进贡,每年觐见以向其盟主表达敬意。<sup>③</sup>例如,一位马瑞驻巴比伦的外交官员在写给金瑞林的信中说“埃兰的苏卡尔写给汉谟拉比的话如下,他说:‘我要前去进攻拉尔萨。召集你的精英军队,让你的精锐部队和仆人们在埃什依那必须准备好前来见我。在我看到的军队中,若有一人反对,我必转向你。’……当埃兰的苏卡尔写给汉谟拉比时,他给瑞姆辛写了同样的话,他说:‘我要前去进攻巴比伦。召集你的精英军队,让你的精锐部队和仆人们必须准备好前来见我。如果我听到你的军队中有反对的话,即使只有一人,我必转向你。’埃兰的苏卡尔写给瑞姆辛上述话。埃兰的苏卡尔派人送给瑞姆辛这一泥板,瑞姆辛派人将它送给了汉谟拉比;汉谟拉比将埃兰的苏卡尔派人送给他的泥板送给了瑞姆辛。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将(与拉尔萨关系的)指令指示给(负责)外国人事务的官员辛贝勒阿坡林(Sin-Bel-Aplim)和私人秘书中的一位书吏,他

①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94.

② Jean Robert Kuppe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II: Lettres royales du temps de Zimi-L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8, nos. 171 - 172.

③ Bertrand 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2, No. 1, 2001, p. 43.

派遣（他们）到拉尔萨。他们和（瑞姆辛的弟弟）辛穆巴里特（Sin-mubali）居住在马什刊沙皮尔（Maškan-Šapir）城。瑞姆辛的一位官员和汉谟拉比待在一起。瑞姆辛的消息定期到达汉谟拉比处，汉谟拉比的消息定期到达瑞姆辛处。”<sup>①</sup>

通过对此书信内容的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该时期国家间外交活动的具体内容。首先，派驻他国的外交使节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将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及时地向自己的国王汇报；其次，信件也明确表明了埃兰获得了凌驾于两河流域几大王国之上的政治优势；最后，信息交换和军事合作是外交书信的重要议题。在揭穿了埃兰人的“离间”阴谋之后，巴比伦和拉尔萨两国经过协商达成了共同反抗前者的决定，瑞姆辛在回信中告知汉谟拉比：“我的军队已经在我的土地上集结了，让你的军队在你的土地上集结！如果敌人向你进攻，我的军队和小船将到达那里；如果敌人向我进攻，你的军队和船只也必须到达那里。”<sup>②</sup>

在《马瑞王室档案》中，类似的外交信件经常出现。例如，在沙姆西阿达德写给他的“兄弟”卡特那王伊什希阿杜的一封信中，既确定了两国间政治联姻的顺利进行，又明确了亚述的属国哈舒、乌尔苏和卡尔凯米什对其亲卡特那、敌对延哈德的外交政策的追随。<sup>③</sup> 巴比伦和马瑞多次就两国之间盛产沥青的希特城（Hit）的归属进行商讨，最后决定由两国共同拥有。<sup>④</sup> 派驻安达瑞格王国的马瑞官员在写给其国王的一封长信中，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安达瑞格和卡拉那（Karana）两国间缔结外交同盟、签订外交条约的具体过程和仪式。<sup>⑤</sup> 安达瑞格王阿覃润在一封信中非常感谢他的“父亲”汉谟拉比赠予他的礼物，有布匹、一件衣服、一个头饰、一把椅子和各种各样的

①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62.

②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67.

③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 Correspondance de Šamši-Adad*,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24, M. 5012.

④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449, 468.

⑤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404.

东西,他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并表示会为他的“父亲”祈祷,<sup>①</sup>等等。

专门研究青铜时代西亚政治的学者米格里奥(Miglio)认为,“马瑞信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们生动地记录了该时期的历史变迁,同时也让人沉浸在持久的文化心态中。这种文化心态有助于帮助我们构建古代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人们的行为。此外,这些信件不仅记录了重要人物和政治事件,同时也证明了塑造古代历史的文化规范和习俗”。<sup>②</sup>通过以上列举的马瑞外交书信,既使人们了解了当时国家间的交往互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同时也阐明了这些交往互动过程中需遵循的惯例、规则和礼仪,可视为对该学者观点的有力证明。

### 三 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的礼物互赠

在古代西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中,互赠礼物是维持和促进盟友间情感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定期的外交礼物往来也可视为两国间友好外交关系正常维系的一种表达。《马瑞王室档案》中有数量众多的行政管理文献记载了马瑞王国与同时代西亚地区统治者之间的礼物(*šubultum/qištum*)<sup>③</sup>互赠行为。据达森(Dossin)教授的统计,有30多位国王的名字出现在这些记录中,涉及的礼物种类包括衣服、布料、金银器皿、戒指、手镯、圆筒印章和罐装葡萄酒等。<sup>④</sup>经进一步统计分析可知,该时期国家间互赠礼物的类型可细分为金、银、铜、锡、宝石等及其制品(如首饰、装饰品、容器),不同材质、等级、颜色的布匹、衣物和皮革制品,酒类,牛羊和马匹等牲畜,奴隶和女伎,等等。而经由这一礼物赠予行为而产生外交联系的国家数量也远多于达森教授的统计。下文以马瑞行政管理文献中记载的金、银、宝石等贵重礼物的

①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363, 372.

② Adam E. Miglio, *Tribe and State,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eign of Zimri-Lim*,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 14.

③ *šubultum/qištum*, 阿卡德语“礼物”。此外,介词词组“*ana X - X*”(给某国王/某城)、动词词组“*ana X - X ublu*”(给某国王/某城送去)、“*mu-tám X - X*”(某国王/某城送来)等,均可表示统治者间的礼物赠送行为。

④ J. M. Munn-Rankin,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 C.,” *Iraq*, Vol. 18, No. 1, 1956, p. 97.

往来为例，进一步说明礼物外交所涉的地域范围和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 (一) 礼物互赠所涉及的地域范围

在本文列举的 12 份<sup>①</sup>记载马瑞向其他国家统治者赠予贵金属礼物的文献中，被赠予礼物的国家有伊朗高原的安善、苏萨，叙利亚地区的卡尔凯米什、延哈德、哈舒和乌尔苏，两河流域东部的埃什依那和南部的巴比伦，北方哈布尔河地区的伊阑簇腊（Ilanûra），北方丘陵地区的腊扎马（Razama）和安达瑞格等国（见表 1）。同时，文献中提及的赠礼缘由也十分多样。有的是恭贺盟友取得军事战役的胜利，如金瑞林统治第 12 年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占领了拉尔萨城并俘获了其王瑞姆辛。有的则是恭贺新王继位，如在金瑞林统治第 8 年的两个文献中，苏萨国王的名字先后为舒勒西库杜尔和库杜舒鲁什，这也表明苏萨的王位发生了更迭。还有的是祭祀王陵以示哀悼，如在金瑞林统治第 10 年的 12 月 27 日，马瑞为已故延哈德国王亚荏林的坟墓送了金银制品，同时给该国继任的王汉谟拉比<sup>②</sup>送去礼物。而多数赠礼则未给出明确的缘由，因此可视为友好国家间的常规礼物往来。

表 1 马瑞向其他国家赠送贵金属礼物文献列举

礼物	价值	赠予对象 (ana X-X)	时间	文献号
1 个 Ana'is 材料制作的大牛头	2/3 斤 4 又 1/3 镗 14 筛银	在诸宝石中，给腊扎马国王沙腊亚 (Šarraya)	金瑞林统治第 5 年 9 月 26 日	ARM XXV 13
1 个银钉，10 个铜钉	每个重 2/3 斤	给伊阑簇腊国王哈亚苏姆 (Haya-sumu)	金瑞林统治第 5 年 9 月 26 日	ARM XXV 15
1 个 Idin-Igi-kur 材料制作的大牛头	重 2/3 斤 6 又 2/3 镗银	给埃什依那国王伊巴勒皮埃勒 (Ibal-pi-El)	金瑞林统治第 5 年 12 月 10 日	ARM XXV 18
10 斤		给哈舒国王阿尼坡胡尔皮 (Anip-hurpi)	金瑞林统治第 8 年 1 月 19 日	ARM XXV 14
1 个天青石制漂亮铭牌		给哈舒国王阿尼坡胡尔皮	金瑞林统治第 8 年 5 月 13 日	

① 在《马瑞王室档案》中，记录统治者间交换礼物的经济管理文献数目繁多，本文仅列举 12 份马瑞向他国赠送礼物、26 份他国统治者为马瑞送来礼物和 1 份记载收支双向交换行为的文献。

② 此处的汉谟拉比为延哈德国王亚荏林的儿子和继承人，与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同名，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库尔达 (Kurda) 国王也名为汉谟拉比。

续表

礼物	价值	赠予对象 (ana X-X)	时间	文献号
大的【……】制 <i>širim</i> 容器	重 1/2 斤	给苏萨国王舒勒西库杜尔 (Šulši-kudur)	金瑞林统治第 8 年 2 月 7 日	ARM XXV 6
【……黄金制的器皿】	重【……】	给安善国王筛坡拉尔帕克 (Šep-larpak)	金瑞林统治第 8 年	ARM XXV 5
大的银制 <i>širim</i> 容器	重 1/2 斤	给苏萨国王库杜鲁鲁什 (Kudušuluš)		
1 个银制 <i>katapu</i> , 它金制的“眼睛”和他的“奠基锥”		给亚荏林的陵墓 ( <i>kim-ahum</i> ), 在泰尔喀城, 于 18 日	金瑞林统治第 10 年 12 月 27 日	ARM XXV 17
1 个拉长的金制【……】	重 2/3 斤 8 铤	给延哈德国王汉谟拉比		
2 个大的【……】	重 2 斤 1/2 铤	给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	金瑞林统治某年 9 月 28 日	ARM XXV 8
1 个大克里特 (风格) ( <i>kaptaritum</i> ) 容器	重 12 斤	阿坡拉韩达送来的, 给安达瑞格国王阿覃润		
【……】	重【……】	与天青石一起, 给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 当拉尔萨城被占领时	金瑞林统治第 12 年 6 月 7 日	ARM XXV 9
【……】	重 1 斤黄金	与亚舒下阿沙尔制作的【……】石一起, 给卡尔凯米什国王阿坡拉韩达	【……】	ARM XXV 12
1 个锡制容器		给乌尔苏城的礼物	【……】	ARM XXV 16
1 个大的金制罐子	重 1/2 斤 8 铤	给埃什依那国王采里辛 ( <i>Silli-Sin</i> )	金瑞林统治第 13 年 8 月 5 日	ARM XXV 19

注: 文献中的一些金属材料和制品目前尚不知其准确含义, 故原文引用, 未做汉译, 文献破损处以【……】表示。表格中的 ARM XXV13 表示《马瑞王室档案》第 25 卷第 13 号文献, 下同。

资料来源: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同时, 马瑞行政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国家向马瑞王国赠送贵金属礼物。例如, “1 个金环, 重 5 铤<sup>①</sup>; 4 铤做 1 个 an-dùl 饰品, 1 铤做 1 个指环, 2 个大的银制 *širim* 容器, 重 1/2 斤 9 又 1/2 铤, 塔勒哈于 (Talhawum) 国王送来 (mu-túm) (金瑞林统治第 9 年 12 月 22 日); 1 个大的银制野山羊头, 重 1/2 斤 2 铤, 它的两个角和胡须是金制的, 乌尔苏国王筛那姆 (Šennam) 送

① “铤” (gín), 古代两河流域的重量单位, 1 ma-na = 60 gín (即 1 斤 = 60 铤)。

来（金瑞林统治第10年1月13日）；金制【……】，其中，1个 *sugūnu* 容器重1/2斤【……】镗，（延哈德王）亚荏林送来（金瑞林统治第10年3月7日）；<sup>①</sup> 1个大的金制 *burzi* 容器，重1/3斤，古卜拉（毕布罗斯）国王严廷哈姆（Yantin-Hamu）送来（金瑞林统治第10年3月7日）”。<sup>②</sup> 在本文统计的26份类似文献中，<sup>③</sup> 向马瑞赠送礼物的国家有叙利亚地区的扎尔瓦尔（Zarwar）、卡尔凯米什、卡特那、延哈德、哈舒和乌尔苏，地中海岸的古卜拉和哈卓尔（Haūura/Hazor）<sup>④</sup>，两河流域北部丘陵地区的安达瑞格和腊扎马，哈布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塔勒哈于（Talhawum），上底格里斯河地区的小国舒达（Šuda）。

此外，还有的文献同时记载了外交礼物收入和支出的双向流动。例如，“14塔兰特（gú）<sup>⑤</sup> 30斤锡（an-na）来自马瑞城；1塔兰特锡，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阿勒颇城使人送来；20斤锡，（安善国王）筛坡拉尔帕克送来（mutúm）；20斤锡，（卡特那国王）伊什希阿杜和亚塔尔阿杜的礼物（qštum），在乌忒里特城，总计16塔兰特10斤锡，头等珍贵的宝物（mākkurum）。在其中：11又2/3斤锡给沙姆西阿达德，9塔兰特27又1/2斤8镗给亚荏林，1塔兰特1/2斤7镗给查筛阿（Gašera），30斤锡给汉谟拉比，16又2/3斤锡给塔卜巴拉提（Tab-bala ōi），8斤锡给辛阿布舒（Šin-abušu），在阿勒颇（Halap<sup>ki</sup>）”。<sup>⑥</sup> 仅该文献中涉及的国家就有马瑞、巴比伦、安善、卡特那、乌忒里特、亚述和延哈德等。

据统计，马瑞行政管理文献中记录的经由礼物赠予行为而建立起外交

- 
- ① 根据该文献记载，延哈德王亚荏林于金瑞林统治第10年的3月7日给马瑞送来了这些礼物。同时，在上文提及的马瑞王向其他国家统治者的赠礼中，金瑞林在该年的12月27日又为亚荏林的陵墓赠送了金银祭品。据此可推算，延哈德王亚荏林的去世时间应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
- ②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nos. 48.
- ③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nos. 20 – 30, 33, 35 – 48.
- ④ “Haūura 为 Hazor 在阿卡德语文献中的写法，其遗址哈卓尔丘位于加利利海以北的上加利利地区，在科拉津高原（Korazim Plateau）北部。在青铜时代中期（大约公元前1750年）和以色列时期（公元前9世纪），哈卓尔是该地区最大的要塞城市，也是新月沃土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 ⑤ gú [塔兰特 (talent)]，古代两河流域的重量单位，1 gú = 60 ma-na (1塔兰特 = 60斤)。
- ⑥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nos. 118.

联系的古代西亚地区的城市和国家数量不少于74个。<sup>①</sup>即使某些国家间没有进行直接的礼物赠予行为,却也与礼物互赠的某一方有直接联系,如马瑞送给安达瑞格王阿覃润的一件重达12斤的克里特风格的容器,是由卡尔凯米什国王阿坡拉韩达送给金瑞林的;<sup>②</sup>哈卓尔国王依卜尼阿杜(Ibni-Addu)在乌晷里特为马瑞送去金银礼物等。<sup>③</sup>由上述列举文献所载王国和城市名可知,公元前2千纪早期西亚国家间的礼物交换行为已然遍及了叙利亚地区、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北达安纳托利亚高原,南至地中海东岸。

## (二) 礼物互赠的一般原则

礼物互赠同定期的书信往来一样,都被视为互赠或通信双方政治友好关系确立和维系的一种表现。书信往来可以被用来在国家间进行信息传递,而古代近东外交中的礼物互赠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贸易形式,“众所周知,君主之间互赠礼物只是一种贸易的形式”。<sup>④</sup>由于西亚地区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加之某些稀缺资源被当地国家的王室垄断,礼物交换的主体又只能为各国的统治者,因而这一时期国王们之间在互赠礼物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等价交换”。

不过,尽管各国国王在交往时似乎一般都避免对礼物的价值进行“讨价还价”,但也有文献对此进行了直接的记录。例如,在一封卡特那国王伊什希阿杜写给他的“兄弟”埃卡拉图王伊什美达干的信件中,前者直接表明礼物的赠与不仅是友谊的表达,其价值在赠予者和接收者眼中应是相等的:“对伊什美达干说,你的兄弟伊什希阿杜的话如下:这件事,本来我们不应该谈论它,但是现在,我必须说出来,以让我的心得到解脱。你表现得像一位大王!你向我要求了你想要的2匹马,我使人给你送去了。你却使

①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pp. 245-248.

②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nos. 8.

③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nos. 45.

④ I. E. S. Edwards, C. J. Gadd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Part 1,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800-1380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6.

人给我送来了 20 斤锡！你有什么要求不会不告诉我，可你给我的锡不多，任何听说这件事（即该次礼物交换）的人都不会把我们放在同样的地位上。如果你没使人给我送来那些东西就好了。关于我父亲的神，我的心难过。这 2 匹马在卡特那城的价格是 600 锱银，你使人给我送来 20 斤锡。知道的人会说些什么？他们不会嘲笑我们吗？这一宫殿就是你的宫殿，在你的宫殿里缺少了什么东西，一个兄弟没有满足一个兄弟的愿望吗？如果你没有使人给我送来那些锡，我的心就不会难过了。你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一宫殿就是你的宫殿。”<sup>①</sup>由此可见，伊什希阿杜书信表达的核心要义就是双方所交换礼物价值的不对等问题。根据《汉谟拉比法典》相关条文的规定和马瑞经济文献的记录，一头牛的价格不高于 20 锱（1/3 斤）银，一头驮驴的价格通常在 20 锱左右，且根据驴的饲养情况和年龄在 12 锱到 30 锱。<sup>②</sup>但是伊什希阿杜信中提及的 2 匹马的价格为 600 锱（10 斤）银，可见马在当时西亚社会中的珍稀程度。同时，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锡和银的价值比在 14:1 到 10:1。<sup>③</sup>也就是说，伊什美达干的礼物价值为伊什希阿杜礼物价值的 1/7 到 1/5。对等的交换不仅使参与交换的国王们获得珍贵的礼物，而且也可以使其在盟友、附属国和臣民那里获得声望。但在这里，伊什美达干的行为显然损害了伊什希阿杜的声望。所以，伊什希阿杜指责他说：“任何听说这件事（礼物交换）的人都不会把我们放在同样的地位上。……知道的人会说些什么？他们不会嘲笑我们吗？”

从另一角度看，统治者赠送礼物的价值也只有在收到对方的回赠后才能得以衡量。伊什希阿杜的书信表明，赠出礼物的一方预期在地位平等的对方那里得到的是价值相等的礼物，这是该时期西亚外交中国家间礼物互赠的一般原则，而统治者间互赠礼物的行为还可看作关于“礼物”与“回礼”的一场外交博弈。<sup>④</sup>

①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V: Correspondance de Yašmah-Addu*,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2, nos. 20.

② Jack M. Sasson, "A Sketch of North Syri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9, No. 3, 1966, pp. 175, 293-295.

③ Jean Bottéro,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V II: Textes Économiques et Administratifs*,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7, nos. 233, nos. 88.

④ Jean-Marie Durand,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I: Textes Administratifs des Salles 134 et 160 du Palais de Mari*,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83, pp. 506-516.

#### 四 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联姻

政治联姻是发展和维系利益相关的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又一重要手段。正如上文所述,古代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人们深信家庭的观念,他们以构建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兄弟”“父子”关系去理解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sup>①</sup>而姻亲关系的建立可以使两国间“虚拟的”血缘关系变得真实,在王室长大的公主们自然是承担这一使命的不二之选。由于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的国王们从不迎娶自己的姐妹,他们自然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盟友国或是盟主国。“要么把你的女儿给我,要么让我把我的女儿给你”“愿我们之间的家庭关系不要破裂!”<sup>②</sup>马瑞王金瑞林与卡特那公主和延哈德公主的联姻,巴比伦王汉谟拉比与埃什依那公主和马瑞公主的联姻,伊什美达干之子与东部山区图如库(Turukkû)王扎兹亚(Zaziya)的女儿的联姻,<sup>③</sup>阿拉拉赫(Alalah)国王阿米塔库(Ammi-taku)与阿皮沙勒(Apišal)的公主的联姻,阿米塔库之子与埃卜拉公主的联姻,<sup>④</sup>马瑞公主们与北方诸小王国的统治者们的联姻,<sup>⑤</sup>均是在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诸国借政治联姻建立彼此真实关系的案例。

因此,王室公主对于每一位国王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他们既可以将

- 
- ① Raymond Cohen, Raymond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0.
  - ② Jesper Eidem, Læssøe Jørgen, *The Shemshara Archives I: The Letters*,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2001, nos. 874.
  - ③ Bertrand Lafon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lliances et diplomatie au temps des royaumes amorrites,” *Amurru*, Vol. 2, 2001, pp. 312 - 313.
  - ④ J. M. Munn-Rankin,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 C.,” *Iraq*, Vol. 18, No. 1, 1956, p. 94.
  - ⑤ 根据文献记载,马瑞公主西马吞(Šimatu)和基如(Kirû)与伊阑簇腊国王哈亚苏穆(Haya-Sumu)联姻,公主尼卜沙瑞(Inib-Šarri)与阿什拉卡(Ašlakka)国王伊巴勒阿杜(Ibal-Ad-du)联姻,公主尹巴吞(Ibbatum)与安达瑞格国王阿覃润联姻,公主那冉吞(Narâmtum)与埃鲁胡特(Elluhut)国王沙腊亚(Šaraya)联姻,公主提兹帕吞(Tizpatum)与舒那(Šuna)国王伊里伊什塔尔(Ili-Ištar)联姻。婚后这些联姻公主均有与其父亲金瑞林的书信往来。对她们书信档案的整理、翻译与具体论述,参见陈艳丽《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金瑞林后宫等级结构重建与王室妇女研究(1775 - 1762 BC)》,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第210~254页。

女儿嫁与地位平等的盟友为妻，来巩固双方的联盟；也可以将女儿嫁与自己的附属国国王，并在理想的情况下由此获得一位忠诚的仆人，甚至可以期待本次政治联姻诞下的王子成为该国的继承人；他们还可以将女儿作为大祭司献给神明，使其在神明面前为她父亲的健康和国家的繁荣祈祷。而这也是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的王室妇女们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重要原因。<sup>①</sup> 以马瑞国王金瑞林统治时期为例，马瑞行政管理文献中记载的金瑞林统治时期的马瑞公主至少有 25 位，其中 2 位是他的姐妹，23 位是他的女儿。<sup>②</sup> 其中一位公主成为暴风雨神阿达德（Adad）的女祭司，<sup>③</sup> 另一位公主成为太阳神沙马什（Šamaš）的女祭司。<sup>④</sup> 此外，有文献证据表明至少有 11 位马瑞公主曾被送出国去联姻。<sup>⑤</sup>

古代近东国家间的政治联姻还需遵循一套固定的流程。首先，一国提出求娶另一国某位公主，接受国给出答复。随后，两国互派使节以考察联姻公主，协商嫁妆的数量和聘礼的价值。最后，求娶的一方需派出迎亲队伍出行迎娶，返回后则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sup>⑥</sup> 其中，关于“嫁妆”（*nidintam*）与“聘礼”（*terhatum*）的商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嫁妆”和“聘礼”也是各国间礼物交换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家境富裕的女性来说，其嫁妆一般包括家用器具、银饰、奴隶甚至田地。后来嫁妆中又包括了其他家庭用品，如家具、纺织品和珠宝。<sup>⑦</sup> 王室公主们会从她们

- 
- ① 陈艳丽：《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室妇女的社会地位研究》，《史学月刊》2018 年第 12 期，第 74~80 页。
  - ② Nele Ziegler, *Florilegium Marianum IV: Le Harem de Zimri-Lim*, Antony: La Société pour l'Étud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1999, nos. 1-8, 11, 13, 31.
  - ③ Dominique Charpin, Jean-Marie Durand, *Florilegium marianum II: Recueil d'études à la mémoire de Maurice Birot*, Paris: La Société Pour l'Étud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1994, nos. 62.
  - ④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 Correspondance Fémini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Ceuthner, 1978, nos. 37.
  - ⑤ Stephanie Dally, *Mari and Karana, Two Old Babylonian Cities*,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2, p. 97.
  - ⑥ Bertrand 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2, No. 1, 2001, p. 52; 关于王室联姻的具体协商过程和迎亲队伍的行程安排参见陈艳丽《古巴比伦时期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73~180、192 页。
  - ⑦ Karen Rhea Nemet-Nejat, *Dail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Westport: Greenwood, 1998, p. 133.

的父亲那里获得更多的财富,因为这也是统治者展现自己财富和权力的一种方式。例如,沙姆西阿达德曾将自己的一个附属国作为其女儿的嫁妆:“我将用黄金为你制作一座金像,为我制作一座金像,‘兄弟’拥抱‘兄弟’。我将把我的女儿给你,作为我女儿的‘嫁妆’,我将把舒沙尔腊国(Šušarra)给你。”金瑞林为与北方小国伊阑簇腊联姻的女儿西马吞准备的嫁妆有金制的蜘蛛和香菜籽粒(装饰品),白色的肾状和块状宝石共2塔兰特(约120斤),以金饰为主的各种金银饰品,各种青铜容器,还有匕首,不同材质和用途的布匹,以及床、椅、脚凳和外国风格的桌子等价值不菲之物,总计117件。此外,公主出嫁时还有10位陪嫁女仆,其中1位是女书吏。<sup>①</sup>

而卡特那王国为了与北部强邻延哈德相抗衡,即使历经统治政权更迭,也始终保持了与马瑞王国的盟友关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两国王室间长期进行联姻。在亚述人统治马瑞时期,卡特那国王伊什希阿杜将女儿贝勒图姆(Beltum)嫁给沙姆西阿达德之子、马瑞总督亚斯马赫阿杜。伊什希阿杜为女儿准备的嫁妆价值10塔兰特银,其中包括价值5塔兰特银的纺织品。而沙姆西阿达德给出的聘礼包括金、银、牛、羊等,价值5塔兰特银。<sup>②</sup>鉴于与卡特那的盟友关系对于亚述非常重要,沙姆西阿达德非常重视两国间的这次联姻,前后十几次写信给亚斯马赫阿杜指示关于聘礼准备、迎娶等事宜。<sup>③</sup>但沙姆西阿达德去世之后,延哈德趁机出兵支持金瑞林驱逐了亚斯马赫阿杜,使其重获对马瑞的统治权。随着亚述对马瑞统治的终结,伊什希阿杜对卡特那的统治也结束了,因为一位卡特那新王的名字阿穆特皮埃勒与瑞姆辛、金瑞林、亚荏林、汉谟拉比等一同出现在上文列举西亚地区几大政治势力的书信之中。金瑞林通过迎娶卡特那公主旦胡腊采的方式与卡特那新政权保持友好关系。<sup>④</sup>同时,他也致

① Michaël Guichard,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XI: La vaisselle de luxe des rois de Mari*,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2005, nos. 27.

②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 Correspondance de Šamši-Adad*,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46, 77.

③ Jean-Marie Durand, *Les document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 (Tome III)*,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2000, nos. 2000, 1005-1007, 1009-1013.

④ 陈艳丽:《古巴比伦时期旦胡腊采的“马瑞王后”身份论证》,《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1期,第87~92、140页。

力于调节卡特那与延哈德之间延续已久的敌对关系，“随着建立于贸易之上的繁荣，马瑞有各种兴趣与这座位于叙利亚荒原另一端的、奥龙特斯河中游的重要城市保持良好的关系。毫无疑问，金瑞林亲自致力于实现卡特那和阿勒颇这从前的对手之间的和解，于是，恢复和平的协议在阿勒颇达成了”。<sup>①</sup>

同时，金瑞林在登上马瑞王位之初就立即派出使节迎娶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举动表明，延哈德对于金瑞林的军事支持应是基于双方达成的政治联姻的约定。金瑞林为西卜图准备的聘礼有大块的天青石，3块塔兰特的天青石制品，大量黄金制品和白银饰品，各种材质和等级的布匹、皮革，3头公牛，100只母牛、(1+)千400只羊、(1+)塔兰特白银。<sup>②</sup>此外，该时期的不少文献表明，西卜图是一位兼具杰出管理才能和政治才干的王室妇女，她在马瑞宫廷的行政管理、国家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极地维护前者与延哈德间的友好外交关系。

此外，数名马瑞联姻公主写给其父亲金瑞林的书信及内容表明，联姻公主们还需承担搜集情报的职责。这或许也可以解释金瑞林为女儿西马吞准备的嫁妆中包括1位女书吏。例如，西马吞在写给金瑞林的信件中，详细汇报了哈亚苏穆与舒巴特恩利勒国王图润那特基(Turum-natki)会面、结盟及出兵的过程。她还协助金瑞林将一位马瑞官员送入了舒巴特恩利勒城。<sup>③</sup>同时，西马吞还向金瑞林报告了她所知道的关于埃兰战役的情况。<sup>④</sup>同样与哈亚苏穆联姻的公主基如不仅向金瑞林提出了对待哈那游牧民族的建议，还将哈亚苏穆处死了马瑞派驻伊阑簇腊使者的消息告知了她的父王。<sup>⑤</sup>与阿什拉卡国王伊巴勒阿杜成婚的伊尼卜沙瑞则向金瑞林汇报了自己的丈夫

- 
- ① I. E. S. Edwards, C. J. Gadd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Part 1,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800 - 1380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 - 21.
  - ② Henri Limet,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nos. 616.
  - ③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 Correspondance Fémini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78, nos. 5.
  - ④ Charles-F Jea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I: Lettres Diverses*,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95.
  - ⑤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 Correspondance Fémini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78, nos. 3, 35.

违抗命令、擅自越过哈布尔河的军事行动。<sup>①</sup>

最后,进行政治联姻的王室公主们的命运,也与母国和联姻国之间的关系变化紧密相连。例如,与亚斯马赫阿杜联姻的卡特那公主贝勒图姆,因初到马瑞水土不服而生病,亚斯马赫阿杜一度对她非常关心。<sup>②</sup>可当后者不再喜欢贝勒图姆并意欲将其迁出马瑞宫殿之时,却遭到了他的父亲沙姆西阿达德的严厉申斥。沙姆西阿达德警告他的儿子,这样的做法会引起她的父亲伊什希阿杜的不满。为了维持双方的联盟,亚斯马赫阿杜不仅要让贝勒图姆继续居住在棕榈宫殿之中,还要满足其各种要求,以使卡特那国王满意。<sup>③</sup>而与伊阑簇腊国王联姻的马瑞公主基如和与阿什拉卡国王联姻的马瑞公主伊尼卜沙瑞则没有这么幸运。随着她们丈夫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并意欲脱离马瑞的掌控,而她们自己又忠诚于自己的母国,不断将获得的各种情报汇报给她们的父王金瑞林,这两位马瑞公主在联姻国的境遇十分凄惨。其中,基如因为不断遭受生命威胁<sup>④</sup>而数次向其父亲求助;<sup>⑤</sup>而伊尼卜沙瑞则被赶出阿什拉卡城,并被切断了一切物资供应。<sup>⑥</sup>有学者对伊尼卜沙瑞和伊巴勒阿杜的联姻进行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位妇女因为政治联姻被赠给了一位充满野心的北部的两河流域国家的小国王。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后者的好战性不断提升,伊尼卜沙瑞的处境则变得不堪忍受。”<sup>⑦</sup>

- 
- ①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 Correspondance Fémini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Ceuthner, 1978, nos. 76.
- ② Dominique Charpin, Joannès Francis, Lackenbacher Sylvie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nos. 298.
- ③ Jean-Marie Durand,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Royaume de Haute-Mesopotamie II,” *Mari Annales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s* 6,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0, pp. 290 – 292.
- ④ Jean-Marie Durand, *Les docyment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 (Tome III)*,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2000, nos. 1229.
- ⑤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 Correspondance Fémini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Ceuthner, 1978, nos. 47.
- ⑥ Charles-F. Jea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I: Lettres Diverses*,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113.
- ⑦ Jack M. Sasson, “Biographical Notices on Some Royal Ladies from Mari,”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 25, No. 2, 1973, p. 63.

## 结 语

除了外交书信往来、互赠外交礼物和政治联姻之外，根据《马瑞王室档案》的记载，各国统治者之间的互访也是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外交往来的一种主要方式。<sup>①</sup>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瑞王金瑞林在其统治期间前往乌忒里特的一次旅行。<sup>②</sup>金瑞林的此次旅行历时五个多月，除了携带了大量包括锡、纺织品、服饰、鞋类、珠宝和武器在内的礼物，还有随行人员 4000 余人。在旅程中，金瑞林在其附属国伊阑簇腊进行了短暂的停留，以震慑哈亚苏穆这位怀有异心的附属国国王。他赠送给了哈亚苏穆“1 个金环，2 个装饰着青金石的印章，1 个普通铁环，1 条亚麻腰带”。哈亚苏穆也向金瑞林进献了贵重的礼物，以示意其忠诚，并换取马瑞对后者的持续支持。在途经延哈德王国所属的几座城镇时，他分别向延哈德国王亚荏林、王后沓筛阿（Gašea）及延哈德的一些王室成员赠送了礼物。尤其是与亚荏林本人会面时，马瑞国王又送上了各种纺织品和贵金属作为见面礼。随后，金瑞林和亚荏林又结伴而行，直达乌忒里特城。这两位盟友在该城又彼此交换了礼物，其中包括延哈德人送给马瑞人的葡萄酒和蜂蜜。这两种原产自地中海的物品深受当时两河流域统治者的喜爱。而金瑞林也将随行携带的锡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延哈德、乌忒里特、卡特那和哈卓尔的盟友。因此，通过《马瑞王室档案》中对于金瑞林此次“地中海之行”的详细记录，可进一步反映出西亚各国间在外交往来中的行为模式及准则。

总之，《马瑞王室档案》中的行政管理文献和外交书信展示了青铜时代

---

① Georges Dossi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 Correspondance de Šamši-Adad*,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42; Charles-F. Jean,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I: Lettres Diverses*,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nos. 78, 82.

② 对金瑞林此次地中海之行的详细叙述，参见 Jack M. Sasson, “Zimri-Lim Takes the Grand Tour,”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47, No. 4, 1984, pp. 246 - 251; Jack M. Sasson, “Texts, Trade, and Travellers,” in Joan Aruz, Kim Benzel, Jean M. Evans, eds., *Beyond Babylon, Art, Trade, and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8, pp. 95 - 100.

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交往的完整图景。<sup>①</sup> 在这一时期，尽管西亚地区存在众多大小不一的王国，甚至彼此间有强烈的敌意，但是其统治者主要来自阿摩利部落集团。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结构之下。在这种共同文化背景下，西亚地区的国王们借鉴了青铜时代早期各国间通过结盟、外交联姻、贸易、征服等相互往来的模式，同时结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形势，将其进一步复杂化和制度化，从而共同塑造了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的多元外交体系。而这一外交体系内固有的惯例、制度和礼仪，则将深刻影响青铜时代晚期（或所谓“阿马尔纳时期”）近东大国间的外交准则。由此，“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有条理的和完整的外交体系在整个近东地区发展起来”。<sup>②</sup> 而此类通过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做法，在之后的古代西亚历史上还会反复出现。因此，对于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各国间外交往来的研究，或许也可以为解决现今西亚地区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刘金虎]

- 
- ① Adam E. Miglio, *Tribe and State,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eign of Zimri-Lim*,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4, pp. 10 - 12.
- ② Bertrand 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2, No. 1, 2001, p. 39.